

深度解读

多重解读呈现作品魅力

高海平



赵建雄在诗集《时间的暗伤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,2022年8月出版)后记中写道:“写诗是一件痛苦的事。”写散文又何尝不是呢,所以我深有同感。写作的过程是痛苦的,作品一旦完成,愉悦便占据上风,最终的结果是快乐的,就像女人分娩一样。

不管是写散文,还是写诗,有一个共同点,所要描写的事物都是自己有感而发,有自己独特的体验,至少在自己的眼里是唯一的。这种唯一往往会产生意外的效果。比如说,某某作品被中小学的语文试卷采用了。出题的专家们对你的某某作品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提问,要求学生给出自己的正确解读。好多作家(诗人)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作家(诗人)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出题专家如此刁钻地提问,往往一头雾水。因为他创作时并没有想这么多,也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。但是到了出题专家手里,却能一二三地列出那么多的问题考学生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:作家(诗人)的作品具备了多种解读的可能,而且这种解读还符合逻辑,从而达到共鸣,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作品的成功。我把这种作品称为六边形或者多边形作品。

赵建雄的诗集《时间的暗伤》里面有很多作品具备了六边形或者多边形作品的特点,也就是具备了优秀诗歌的魅力。《时间的暗伤》是赵建雄出版的第三部诗集,艺术风格已经完全摆脱了当初那种吟风弄月的小情调,进入了对生活和生命的深度思考。能提出“时间的暗伤”这样的命题,正是他由清浅走向深沉、由表象走向抽象的标志。比如《故乡》:“我是故乡走失的孩子/只把哭声和欢笑留给了故乡/我和故乡彼此寻找着/故乡,走成一条消瘦的河/故乡,站成一朵落色的花/故乡,长成母亲一对塌陷的乳房/我从故乡走出来/四十年了,一路走着/至今还没有走回去。”这首诗从两个角度叙述,一个是拟人化的故乡,一个是诗人自己,二者彼此都在寻找对方。故乡的河流消瘦了,花朵落色了,母亲的乳房塌陷了。用三个意象说明时间的流逝,没有寻找到对方。同样,诗人走出40年了,还没有走回去。彼此的思念一直存在着,一直无法

达成和解。这中间肯定有无法释怀的因素存在,这种东西正是留给读者的解释空间。诗歌的魅力也正在这里体现。

赵建雄不是从抽象到抽象、从哲学到哲学的那种写作方式,而是从具象入手进入抽象,从生活实际出发,最后上升到哲学高度。符合人们的思维逻辑,以及艺术审美需求。

诗歌是一种思维极度跳跃的语言艺术。每一句和每一句之间往往存在鸿沟,有的人的思维能够跨越过去,有的人的思维无法逾越。跨越过去的就会说这首诗好,跨越不过去的就会否定。这是诗歌的特性,也是诗人写作时故意留下的盲区,或者是无人区。总有勇敢者喜欢挑战无人区,进入这一区域的人自然会发现大美和大惊喜,进不去的人只能望而却步。

《时间的暗伤》中,某些诗篇着实让年轻人被青春撞了一下腰,让中年人的心受了暗伤,让老年人好了伤疤忘了疼。这是《时间的暗伤》留给不同人群的记忆。

我的阅读

乡土根脉里的文明密码

卜庆萍

再次翻开费孝通先生的《乡土中国》(湖南人民出版社,2025年2月出版),油墨香中浮现的仍是那些扎根泥土的身影。这部写于七十余年前的著作,以冷静的观察与精准的剖析,为我们剥开了中国社会的乡土内核。当现代都市的霓虹模糊了炊烟的轮廓,这本书恰似一把钥匙,让我们在回望中读懂文明的基因密码。

“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,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。”费孝通先生开篇这句论断,道尽了乡土与中国的深层联结。儿时在江南水乡外婆家的记忆,此刻竟与书中的描述完美重叠:村口的老槐树是天然的议事厅,东家建房西家主动帮工,红白喜事全村共同操办,祖辈相传的规矩比成文法律更有约束力。那时不解为何“远亲不如近邻”被奉为圭臬,读罢才知这正是乡土社会的生动注脚——在土地上世代定居的人们,无需复杂契约便可行信任之事,无需精密规则便能维持秩序。这种源于泥土的信用体系,构筑了中国社会最原始的伦理框架。

书中“差序格局”的论述,更让我对中国人的处世逻辑有了本质认知。费先生以“水的

波纹”为喻,形象地阐释了乡土社会以自我为中心、逐层推延的关系网络。这让我想起爷爷的处世哲学:对待家人倾尽全力,对待乡邻热心相助,对待陌生人则保持审慎。这种看似“自私”的伦理观,实则是乡土社会的生存智慧——在资源有限的农耕时代,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,是个体最可靠的生存保障。如今城市里的“社区团购”“邻里互助群”,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差序格局在现代社会的变形延续,印证了乡土基因的强大生命力。

最令人深思的是书中对“礼治秩序”与“法治秩序”的辨析。费先生指出,乡土社会的治理依赖“礼”——一种代代相传的行为规范,它“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,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”。但当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,这种治理模式遭遇了严峻挑战:从农村进城的务工者,带着乡土社会的交往逻辑面对城市的陌生人社会,难免产生摩擦;传统的“人情社会”与现代法治的碰撞,也引发了诸多社会议题。这让我意识到,中国的现代化进程,本质上是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合过程,而非简单的替代。

合上书,窗外的车水马龙

与书中的田园牧歌仿佛在时空里对话。《乡土中国》教会我的,不仅是对传统社会的理解,更是对当下生活的审视。我们抱怨“人情淡薄”,实则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必然阵痛;我们感慨“传统失落”,实则是乡土基因在寻找现代载体。那些融入血脉的诚信友善、守望相助,那些对土地的敬畏、对传统的尊崇,从未真正消失,只是在时代变迁中换了模样。

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写道:“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。”这份乡土性,不是落后的代名词,而是文明的根基。读懂乡土中国,便是读懂我们自己。在追逐现代化的征程中,唯有守护好这份乡土根脉,才能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,让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。这,便是这部经典著作留给当代人的最珍贵启示。



特别推荐

在时代潮水中漂流

姚锦

王安忆又回到了她的上海弄堂。但这次归来,不再是《长恨歌》里“旧时光是压在箱底的一匹织锦缎”,而是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弄堂儿女们的异乡漂流记。《五湖四海》(王安忆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22年8月出版)里的上海,不再是稳固的坐标原点,而更像一个被撬动的支点——从这里出发,时代的潮流裹挟着一批年轻人奔向未知的“五湖四海”。作者用她绵密如针脚的笔触,将这群弄堂儿女的身影,写进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烟水苍茫。

这些弄堂里走出的男女,像无数只卸下锚链的集装箱。当国门初开,第一批人揣着薄薄的通行证挤上南下的绿皮车,命运的轨迹从此被扯成数段:有人沉浮在南海边的贸易

风浪里掘金,有人在北方的重工业烟囱下寻路,更有人兜兜转转漂回黄浦江畔,发觉早已物是人非。王安忆不写传奇,写的是传奇底下的真实。发家者的第一桶金往往沾着灰尘和汗水,书里没有点石成金的“锦鲤”,只有咬着牙在浪潮中扑腾的小人物。

书中对弄堂日常的描摹仿佛加了新滤镜。不再是王琦瑶式的精致风月场,而是鲜活的小市民生活图谱。晾衣杆戳着邻居窗台引发的争执,煤球炉前主妇精打细算的眉眼,甚至男女深夜在公共厨房煮泡面的热气和声响,都被王安忆编织成一幅烟火气十足的时代浮世绘。她剥开宏大叙事的外壳,把弄堂置入全球贸易的语境:老阿姨亭子间的小本生意,和儿子在深圳港的货品往来相互依存;下岗工人靠在码头装卸集装箱养活一家老小——全球化这头巨兽的体温,悄然渗入了街巷的毛细血管。

作者这次写婚姻爱情,更像描绘一种特殊合伙人制度。下海闯荡的弄堂恋人结成“合股公司”,爱情是启动资金,利益捆绑是风险对冲。阿芳和阿

强初抵深圳时挤在集装箱仓库里的相濡以沫令人动容,却在公司上市后沦为计算股份分割的商业博弈。那些青梅竹马的初心,最终在五湖四海的风浪里磨蚀成了经济共同体的契约。当人物在分居协议书末尾签字,爱情和“原始股”一同褪色,我们读到的何止是婚姻变故?这分明是一部用儿女情长写就的民间经济演化史。

合上书页,弄堂的烟火气似乎还在鼻腔盘桓,海港的风声犹在耳畔回响。那些挤在小阁楼分食一碗馄饨的夜,在仓库里逐箱核对货单的午后,站在陌生城市天桥上的彷徨,都是普通中国人三十年命运的微缩模型。作者的妙笔之下,弄堂烟火与码头风云融为一体,时代潮水冲刷着每个人的命运河床,又在那些缝隙里开出倔强的花。

读《五湖四海》,你看到的是一代人如何用青春在潮水里刻下划痕的笨拙和勇敢。当你路过旧街巷,忽然听到某个窗口传来似曾相识的“弄堂腔”,或许里面正藏着一个时代的余音,一段终未被浪涛冲散的历史之音。

